

我對融合教育的感想

陳凱燕小姐

自出生以來，我便注定與其他人不同。深度聽障的我，走的路會較別人艱辛。在求學上，我經歷了很多不同的路程，曾經因為自己的聽障問題，先後在不同的小學及中學就讀。縱使路是艱辛的，但也最終完成了大學學位，實現了自己的心願。

回想八十年代，主流學校的老師對於聽障學童認識很少，很多老師並不懂得如何照顧聽障學童，甚至不願意收取聽障學生，也許當時教育署缺乏為老師提供聽障教學的指引和輔助，然而，能夠進入主流學校，對那年代來說，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因為並不是有很多聽障學生能夠進入主流學校讀書。

記得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老師常在黑板上一邊說教，一邊寫字。要知道，聽障學童除了使用助聽器，也要靠讀唇，兩者配合才能理解老師的教學。因為助聽器並不能使我完全接收老師的講課，然而，當時的老師並不了解我們聽障人士的苦況，他們誤以為我戴上助聽器就如戴眼鏡一樣，可以百分百聽懂老師的說話。曾經有多少次，我的母親，接獲老師的投訴，說我上課不留心，因而忘記帶備上課用品。然而，我的母親，並沒有因為老師的投訴，而責備我，那是因為她十分了解我的苦況。為此，我母親決定替我轉校，並找到一所願意收留聽障學生的主流學校就讀。

升上中學後，我成功考入精英班，可是老師因著重追求卓越的成績，加上不了解我的聽障情況，認為我拖慢了教學的進度，結果我被迫轉入普通班上課。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打擊，不管自己多努力都不會得到別人的認同。幸而獲得普通班的老師開解我的心結，再次振作起來，在普通班輕易考入三甲之內。

升上中五時，家人決定舉家移民加拿大。在父母的悉心安排下，在加拿大完成高中課程。當時，我難以適應純英語的學習環境，幸而學校安排了特殊教育組的督學替我進行每周三次的英文補習，直至我的英文程度走上軌道而慢慢減少探訪次數，讓我獨立起來。同時，督學了解我在學習上的困難，而替我申請租借無線調頻系統(FM機)在校內使用，使我可以更清楚地接收老師的教學內容。而且大多數的老師十分合作，願意為我放慢語調，更在課餘時間替我補習。我自感加拿大的教育政策和老師的態度較香港老師，更真正地為學生著想。

終於完成四年高中課程，得以升上心儀大學。大學的環境與高中情況不同，不再是小班教學，而是一百多人共處在演講廳去聆聽教授說課。幸運地，大學一早已替我安排筆錄者記錄課堂筆記，因為有時FM機並不能完全發揮其功效。我本身是修讀設計系的，由於設計上的理論大多是抽象的概念，有時並不太明白教授的講解，故對我來說，大學課程異常艱深，需要加倍努力才能追上進度。而且，因著功課上的需要，我需要講解抽象的概念給教授及同學，因為英語並不是我的母語，因此我無辦法流暢地表達我想要說的內容，我感到很失落。儘管如此，我仍感激當時大學對我的照顧及支援，使我更加珍惜學習機會。

現在回想過去不同的學習經歷，究竟聽障學童能否在主流學校順利地學習？視乎學校或老師是否願意與聽障學童有良好的溝通和相處。大部分聽障學童比一般學童沉默和被動，因此需要老師帶頭並引導其他同學了解該聽障同學的困難和溝通的方法，並用愛心和關懷的態度對待聽障學童。在良好的學習氣氛下，一般聽障學童在校園生涯會比較順利。學校本身是一個社會的縮影，老師自身的行為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學生對人的價值觀，校方與老師的接納和包容的態度對聽障學生是十分重要，例如：老師可鼓勵聽障學童參與不同活動，或給予他們機會嘗試擔任班長或課長等等，從而肯定聽障學生的能力與其他學生無異。正面的態度能夠使其他人明白殘疾人士，他們亦可以有能力和貢獻社會和尊重他人。總括來說，政府的教育政策—融合教育是需要校方互相配合，才能成功發揮傷健共融的精神。

我有感於千禧年代的聽障學童比較幸福，現在的社會比從前更包容，加上資訊科技的發達，又有很多渠道向政府各界表達不滿。相比之下，八十年代的社會對聽障人士認知不多，主觀地認定聽障學童是愚笨和沒有學習能力的。而且大部分主流學校老師對聽障學童缺乏了解，全因當時的教學政策和各方面都欠缺宣傳和指引，在雙方面欠缺配合下導致不少聽障學童不能擁有愉快的校園生活。在沒有家長會監督學校的年代和缺乏投訴的渠道之下，令不少殘疾學童的家長很無助，無法為孩子爭取更好的教育而錯失學習黃金的時期。希望今後的政府重視聽障學童的學前教育，重整融合教育方向，致力培育聽障學童，讓他們成長後能夠獨立生存在社會。